

美日同盟对华指向性的现状、分歧与前景： 以规则、规范、实践为视角的分析

巴殿君* 耿菲蔓**

| 目 录 |

- | | |
|----------------------------|----------------------|
| I. 引言 | IV. 美日同盟对华战略的分歧及未来展望 |
| II. 研究背景 | |
| III. 美日同盟在规则、规范、实践层面的对华指向性 | V. 结语 |

| 内容提要 |

美日同盟合作正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本文主要基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视角，从规则、规范以及实践三个层面探查美日同盟合作的对华新指向。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综合实力不断提升，在此背景下，美日同盟在规则、规范与实践三个维度进行了战略调整，逐渐显现出对华指向性。在规则层面，中国因素频繁出现在美日同盟的联合声明与防卫指针等文件中，成为了制度化协作的重要内容。在规范层面，双方围绕遏制中国崛起达成战略共识，并通过共同威胁认知形成了同盟规范。在实践层面，美日同盟成为遏制中国的关键工具。研究显示，尽管美日同盟在对华合作中存在威胁感知与政策取向的分歧，但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以及特朗普即将二次执政的背景下，美日同盟合作的对华指向性仍将持续并深化。本文将结合制度主义视角，分析美日同盟的对华战略走向，为理解同盟的演变与合作提供新视角。

· 关键词: 美日同盟, 对华政策, 规则, 规范, 实践

* 第一作者: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副主任, 教授

** 共同作者: 吉林大学 东北亚学院 博士研究生

I. 引言

同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权国家，为了共同的安全利益，在特定时期、特定区域、针对特定对象承诺采取共同军事行动的联盟 (Rapport & Rathbun 2021, 245)。同盟的形成通常与战争、冲突或国际危机密切相关 (张景全 2006, 30)。美日同盟诞生于二战之后，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苏，美国对日本采取了占领政策，在对日片面媾和后，与日本签订了《美日安保条约》，结束对日占领，正式建立起了美日同盟关系 (Cha 2017, 24)。冷战时期，美日同盟成为了美国遏制苏联的重要地缘政治工具。朝鲜战争的爆发，进一步促使美国加速与日本结盟，以充分的利用其地理优势获得后勤支持。冷战结束后，尽管经历了短暂的漂流状态，但美日同盟不仅存续下来，而且得到强化。两国在管理与维系同盟的过程中，不断更新规则、规范和具体实践，使美日同盟合作呈现出了动态演变。

规则是指同盟间的条约、程序以及合作或协商形式；规范是指同盟间面对威胁的共同威胁意识、共同战略意识，简而言之就是同盟共识；实践是指同盟战略与盟国各自战略的融合。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代表者罗伯特·基欧汉指出规则与规范都是国际制度的核心要素。规则为行动提供了具体规定或禁令，而规范则被视为一种道德约束力，规范与规则的确定能指导实践，并影响行为体间的合作 (Robert 2002, 92)。基欧汉进一步提出了规则、规范与实践在联盟合作中的作用，他指出规则和规则能够推动联盟在威胁认知中达成共识，进而推动联盟成员采取行动进行反击 (Robert 2002, 92)。因而，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日同盟在规则、规范层面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的威胁认知，也导致在同盟合作中强化了遏制中国崛起的倾向。基于此，本文将以规则、规范与实践三个层面为主线，探讨美日同盟对华战略的新走向。其中，规则层面将重点考察美日安保协议、安保条约等安全文件以及协商机制中的新动向。在规范层面，将主要分析美日同盟的威胁认知和战略共识的调整。在实践层面，主要以安全战略文件为例，分析两国政策协调的新趋势以及对华合作的具体表现。本文将从规则、规范、实践三个层面分析美日同盟合作的对华新趋势，并分析美日同盟合作中存在的分歧，深度理解美日同盟的对华战略走向。

II. 研究背景

21世纪初以来,国际战略环境发生变化。政治上,大国竞争成为影响国际战略环境的主要因素;经济上,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各国亟需恢复经济活力;安全上,俄乌冲突爆发、中东地区再次陷入战乱、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国际安全局势的整体稳定受到了局部冲突的影响。整体而言,国际战略环境相对混乱,经济全球化倒退、安全化风险加剧,国际战略环境走向稳定的前景并不乐观。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了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性,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美国进行了战略调整,促使美日同盟对华指向性逐步增强。军事上,美国将美日同盟视为牵制中国、掌控印太地区的主阵地;外交上,美国将美日同盟视为推行美国全球气候政策和恢复其在相关政治议题上话语权和领导地位的重要踏板;经济上,突出美日同盟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中的显著地位,谋求以美日同盟牵头重塑全球的供应链体系。拜登执政后,继承了特朗普首次执政时期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美日同盟在印太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于此同时,美日同盟机制也在深化与拓展。美日2+2协商机制向经济领域拓展,衍生出美日经济2+2对话;美日同盟拟建立联合司令部,增强美日同盟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互操作性;美日强化延伸威慑机制,意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局势进行掌控;美日同盟机制的拓展还体现在以美日双边同盟关系为基础构建的美日+网络化同盟体系,该体系旨在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与话语权,同时对崛起中的中国形成围堵之势以遏制中国发展。

美日同盟的对华指向性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部分学者对美日同盟对华指向性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既有研究存在研究议题单一、研究视角较为局限等问题。多数学者就美日同盟对华指向性进行单一议题的研究,例如研究美日同盟对华经济安全政策、美日同盟对华军事安全政策等。与既有研究不同的是,本文以美日同盟的发展与强化为背景分析美日同盟对华指向性,使本文的研究视角具有连贯性。此外,本文以规则、规范、实践三个层面对美日同盟对华指向性进行研究,研究范围涵盖经济、安全等领域,使本文的研究议题较为丰富,具备整体

性。通过对美日同盟在规则、规范、实践三个层面对华指向性的研究,有助于厘清美日同盟遏制中国的内在逻辑,对于理解美日同盟的发展脉络,把握美日同盟的未来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Ⅲ. 美日同盟在规则、规范、 实践层面对华指向性

1. 美日同盟在规则层面对华指向的升级

(1) 新版防卫指针中的对华指向性

1951年美日签订《美日安保条约》,美国结束对日占领政策,与日本结成同盟。美日同盟关系形成后,双方签署了一系列条约,多次发布联合声明,并建立了多种合作协商机制。随着冷战结束,美日同盟在经受短暂的“漂流”后重新定义了同盟关系,美日同盟合作得到了强化(Christensen 1999, 44)。进入21世纪后,国际环境发生剧变,中国崛起为美国带来了危机感,全球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促使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其战略意图在于巩固盟友关系、增强战略信誉,借力亚洲市场、重振国家经济,制衡中国发展、维持领导地位(阮宗泽 2014, 5)。以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为起始,美国愈发关切中国崛起,美国对华政策逐渐由接触+遏制转变为防范+遏制。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开启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拜登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并未得到缓解,甚至在经贸、新兴科技、网络安全等领域愈演愈烈,美日同盟合作中的涉华议题开始逐渐增多。可见,美国始终在美日同盟涉华政策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下文将通过《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美日联合声明以及美日2+2经济对话机制分析美日同盟在规则层面的合作呈现出了哪些对华政策新态势。

(2) 联合声明中的中国因素

20世纪70年代，美日首脑联合声明中曾首次提及台湾问题，时隔50多年后，美日再一次在首脑联合声明中提及了台湾问题，并承诺加强同盟合作应对中国胁迫。2021年4月16日，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会谈。两国首脑于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声称两国关注“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指责中国违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同时强调了保持威慑力的重要性 (Liff 2022, 144)。尽管此次两国首脑共同声明并未对台湾做出安保承诺，但是其对中国台湾问题的染指表明，美日同盟对华战略竞争的步调趋向一致。此次声明还提及了多个中国议题，如钓鱼岛、南海、人权问题、供应链安全以及高科技竞争等话题。2024年4月10日，时任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白宫举行会谈后，宣布两国战略合作进入新时代。美国国务院发布了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重申了美日两国维护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的决心。在联合声明中，拜登重申美国根据该《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对日本防卫的坚定承诺，强调第五条也适用于钓鱼岛。美日联合声明释放的战略信号已然十分明确——美日同盟合作将得到升级，并共同开展对华竞争。

(3) 经济版“2+2”对话中的涉华因素

2022年7月29日，美日两国经济部长首次举行会晤，此次会晤被看作是经济领域的美日2+2协商对话机制 (李巍 2023)。双方强调将通过七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和印太经济框架 (IPEF) 开展经济合作。¹⁾ 2023年11月美日两国举办了第二次会晤，两国在会晤声明中表达了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抨击，有美国学者指出，会晤表明，美日担心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成为主导者的角色，因此，将运用小多边机制在经济层面遏制中国的发展 (Goto 2022, 257) 这也表明美日开始强调经济安全的重要作用，两

1) 美国国务院,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S.-Japan Economic Polic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Strengthening Economic Security and the Rules-Based Order”,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f-the-u-s-japan-economic-policy-consultative-committee-strengthening-economic-security-and-the-rules-based-order/>. (2023年7月8日访问)

国在供应链、数字经济、清洁经济、公平经济等领域将针对中国开展合作，从而提升竞争力。2024年9月26日，美日举行美日经济政策协商委员会副部长级会议，会议重申了美国和日本领导人最大限度地协调两国经济和技术战略的愿景。与会者讨论了共同努力发展多样化和可持续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强调了促进和保护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以及扩大开放无线接入网技术的全球市场份额和商业化的重要性。

2. 美日同盟在规范层面对华威胁认知的调整

(1) 美日达成遏制中国的共识

随着中国崛起，中国成为了美日同盟视域中的外部威胁，美日认为中国的崛起对其主张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造成了挑战，担心影响美国的霸权地位，遏制中国崛起成为美日同盟的目标之一。

2012年，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就曾指出，美日同盟最重要的战略任务是保护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美国也明确表示要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抵御来自中国的挑战，并强调了美日同盟合作将成为美方亚洲政策的基石（高桥庆吉 2021, 144）。说明日美的威胁感知具有趋同性。安倍之后的历届首相均坚持了这一立场。两国也在美日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中多次表示，“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行动表示严重关切”，同时，多次强调了《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的言论。上述证据表明，美日在对华认知层面基本达成了共识。

(2) 美日遏华的安全政策趋同

冷战时期，为应对苏联威胁，美日形成了美主日从的依附型同盟关系。其中，美军充当矛，担负进攻作战任务；日本自卫队扮演盾，负责向美军提供后勤补给和装备保障。冷战结束后，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虽然有所变化，但始终没有打破这一关系格局。²⁾ 2022年12月，日本

2) China Military, http://eng.chinamil.com.cn/BILINGUAL/Opinions_209205/16200790.

在发布的《国家防卫战略》中，提出要发展反击能力，这一举动打破了美日同盟矛与盾的关系，使日本在同盟中不仅承担防卫责任，还具备一定的进攻性，美日同盟关系中的美主日从模式受到侵蚀。2022年12月16日，日本发布了《国家防卫战略》，该文件明确了日本安全防卫战略的目标，分析了当前战略环境的转变和日本防卫面临的挑战，对日本基础防卫政策、如何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量、日本自卫队的未来发展方向、全球安全合作措施等进行了规划。其中第三部分日本的基础防卫政策提出要发展反击能力。文件中指出，为了应对来自周边地区的导弹威胁，日本需要发展反击能力，“如果对手发射导弹，日本将通过反击能力阻止对手的进一步武装攻击，同时通过导弹防御网保护自己免受来袭导弹的攻击，从而保护日本国民的生命与和平生计”。作为反击能力的最关键环节，日本政府将发展防区外防卫能力，即将“从敌方射程圈外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能力”置于最优先位置（项昊宇 2023）。这说明，日本正通过政策调整，提升日本的防卫自主性，这可能为日本介入区域冲突提供合法依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克里斯多夫·约翰斯通指出，日本获得远程打击能力，将推动美国在技术发布和信息共享方面强化双边协调机制，从而有效地整合日本与美国的能力。³⁾ 发展反击能力意味着日本自卫队具备进攻性质，由原来的专守防卫转向了攻防兼备。美日同盟的互操作性和协同性也将增强，同时将具备进攻属性。

(3) 美國支持日本增加國防開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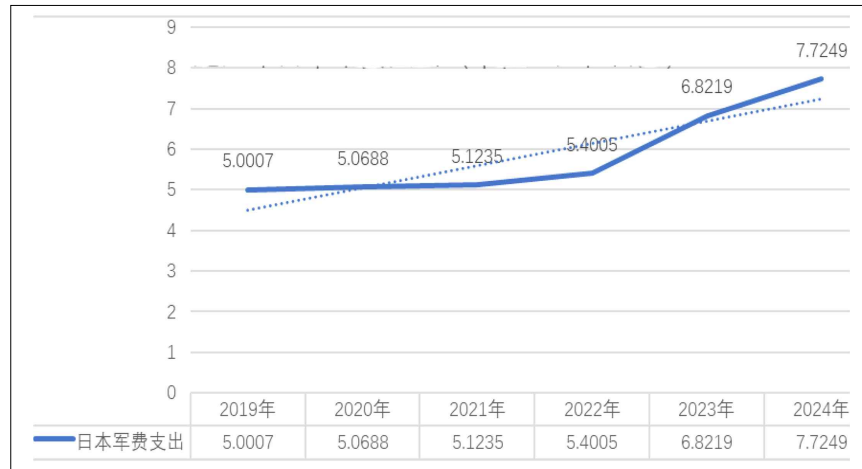
几十年来，日本的国防开支一直停留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或以下。时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计划在五年内将国防开支增加近一倍，达到2%。如果该计划得以全面实施，日本将从全球第九大国防开支国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第三大国防开支国。对于日本增加国防开支的计划，美国默许并表示支持。负责印度-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曾表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受到攻击，美

html. (2024年3月16日访问)

3)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https://www.csis.org/analysis/now-real-work-begins-us-japan-alliance-after-upper-house-elections>. (2023年3月20日访问)

国和日本需要更紧密地合作，以捍卫、维护和加强这一秩序。对于日本即将发布的国家安全相关战略指导文件，伊利·拉特纳表示，美国“支持日本的国防政策，包括提升应对导弹威胁的能力。美国将致力于在未来一年使两国的战略和政策保持一致”。⁴⁾ 布林肯也指出，美国赞赏日本在这些新文件中所概述的承诺，即通过增加投资，加强角色、使命和能力，加强与美国及其他盟国和伙伴的防务合作，实现美日同盟现代化。⁵⁾ 这些证据表明，美日正通过调整国防预算，加强军事能力建设，用以强化对华威慑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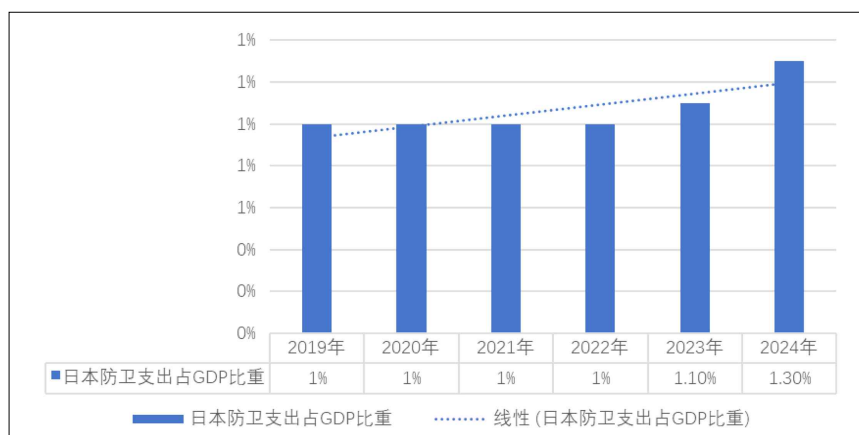
<图1> 近六年日本军费支出(单位：万亿日元)



▪ 日本防卫省(2019-2024)

4) 美国国防部,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3196800/allies-modernization-at-heart-of-us-japan-efforts-in-indo-pacific/>. (2023年3月16日访问)

5) 美国国务院, “Welcoming Japan’s New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and Defense Buildup Program”, <https://www.state.gov/welcoming-japans-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national-defense-strategy-and-defense-buildup-program/>. (2023年3月20日访问)

<图2> 近六年日本防卫支出占GDP比重⁶⁾

·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9-2024)

3. 美日同盟在实践层面防范中国的落实

根据制度主义理论，规则和规范建立了同盟间各个议题的沟通渠道，促进同盟间达成合作共识。在美日同盟对华指向性的发展过程中，美日同盟在规则层面形成了一系列遏制中国的机制，如安全上新版《防卫合作指针》的对华针对性、经济上经济版2+2对话中的涉华因素，以及在政治上将涉华议题纳入美日联合声明中。美日同盟在规则层面的对华指向性促使同盟达成遏制中国的战略共识，在规范上体现为美日对华安全政策的趋同。制度主义理论指出，通过在规则、规范层面进行议题联系，能够加强盟国间的战略合作。美日同盟在规则上的对华指向性促使美日达成威胁共识，进一步强化了美日战略协同。美日同盟由美国主导，因此，美日战略协同更多地体现在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之中。在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同时，美日同盟发挥遏制中国的主要作用。奥巴马执政后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国便开始将其全球战略部署的重心放在亚太地区。拜登政府发布的《印太战略》则进一步将印太地区当作美

6)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2023), "Japan Defense Programs and Budget FY 2023", 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4-04/20230000_modjap_japan_supplementary_2023_japanese.pdf. (2024年11月2日访问)

国的战略基石，美日同盟在美国亚太地区战略部署中的重要性逐步攀升。一方面，美日同盟为美国实现亚太地区战略愿景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美国亚太战略也推动着美日同盟合作机制的强化和发展。因此，在美日构建亚太战略的过程中，中国始终是重点关注对象，美日以防范、遏制中国为战略目标，并借助炒作中国威胁论，以凝聚盟友体系，共同遏制中国崛起。

(1) 21世纪以来的美国亚太战略的转向

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战略内涵主要在于收缩美国的全球力量，将美国的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将在亚洲的力量部署向东南亚地区倾斜；寻求在国内经济与国际战略之间保持平衡；平衡亚太战略中经济、安全、外交等各项战略要素（阮宗泽 2014, 17）。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战略意图在于应对中国崛起、维持美国领导地位；巩固盟友关系，增强盟友对美国领导力的信任度；借力亚洲经济发展的迅猛趋势，重振美国经济。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布《印太战略报告：未雨绸缪、伙伴关系深化和网络化区域建设》，这是美国政府首次正式发布印太战略文件，标志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初步成型（王鹏权 2021, 136）。2019年11月美国国务院发布《自由而开放的印太：推进共同愿景》，标志着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布局正式启动。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并非偶然事件，也绝非仅仅是特朗普对奥巴马政府政治遗产的扬弃，特朗普政府推出印太战略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共同影响。印太战略是美国区域性大战略，囊括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服务于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总体目标。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背景，是在美国霸权护持战略不变的基础上，由于外部环境的威胁发生改变，加上领导人对外部环境威胁认知的不同，从而使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发生变化，因此产生了由亚太再平衡战略向印太战略的转变。同时，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快速崛起等外部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催生了印太战略。拜登上任初期，美国对内以重振美国经济、应对民主危机为主要政策目标，对外以修复同盟关系、重拾美国领导地位为主要目的。在内政外交的政策理念上，拜登与特朗普截然不同，但拜登继承

了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印太战略，并且在对战略环境的总体研判和对战略目标的定性上，两者趋同。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布了首份《美国印太战略报告》，标志着美国印太战略自特朗普执政时期提出，至拜登上任后被延续，成为美国重要的区域性大战略。

<表1> 美国国家战略报告中的涉华因素⁷⁾

时间	文件名称	战略目标	涉华因素
2017年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保护美国人民、保护美国和美国的生活方式 2. 促进美国繁荣 3. 以实力维护和平 4. 提升美国影响力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在大国竞争中，中国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力和利益，试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 2. 中国正在发展先进的武器和能力，可能威胁到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和我们的指挥和控制体系。 3. 尽管美国寻求继续与中国合作，但中国正在利用经济上的诱导和惩罚、影响行动以及隐含的军事威胁来说服其他国家关注其政治和安全议程。
2022年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投资于我们的国家力量以保持竞争优势 2. 用外交手段建立尽可能强大的联盟 3. 推进军队现代化，加强军队建设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意图，而且越来越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使全球竞争环境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 2. 中国行为对国际和平与稳定构成了挑战，破坏了其他国家的民主政治进程，利用技术和供应链进行胁迫和镇压，并输出一种不自由的国际秩序模式。 3. 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图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而且越来越多地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来实现这一目标。
2024年	印太战略报告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建设地区 2. 内外联系推动印度-太平洋繁荣 3. 加强印度-太平洋安全增强地区 4. 抵御21世纪跨国威胁的能力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美国对印太地区关注的增加，部分原因是印太地区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挑战。 2. 中国正在结合其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实力，在印太地区谋求势力范围，并力图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国。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胁迫和侵略遍及全球，但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最为严重。

▪ 美国白宫(2017; 2022; 2024)

7) 美国白宫(202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2024年11月1日访问)

(2) 美日同盟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与角色

美日同盟由美国主导，美日同盟整体的战略走向必然受到美国国家战略安排的影响，21世纪以来，美国亚太战略经历了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以及拜登政府三届政府的调整与转变，在这一过程中，美日同盟不断强化，并且美日同盟合作中的对华指向也在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中体现出来。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以中国崛起、亚太地区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为背景，带有防范、遏制中国崛起的色彩，美日同盟在被重新定义为“全球性”同盟后，扮演着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的角色。特朗普上台后指出大国竞争是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之一，并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随即提出印太战略。印太战略是美国从多个维度同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制度性保证，美日同盟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具有强烈的对华竞争的表现。拜登上台后继承特朗普执政时期提出的印太战略，在着手修复美国同盟体系的同时，以美日同盟为基础，打造美日+形态的多边合作机制，塑造美国网络化同盟体系，在经贸、科技、军事安全等各个领域围堵、遏制中国。美日同盟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同时在美国亚太战略的更新迭代过程中，美日同盟机制的对华指向性也逐步增强。

(3) 美日军事合作范围的拓展

美日加强了军事互操作性。2024年5月10日，日本议会通过了法律，将在2025年3月底之前为自卫队的地面、海上和空中部队建立联合指挥总部，以加强网络空间等新的安全领域的战略部署。从而优化指挥控制架构，此举将大幅促进美日同盟在军事领域的一体化（板山真弓 2024, 56）。美日同盟控制和指挥系统结构的转变将提高同盟的战略互信，并加强同盟在东亚地区的威慑力度。另外，美国国防部计划，在与美国国会进行协调和协商后，将在发展日本联合司令部的同时，重新组建驻日美军统合作战司令部。⁸⁾ 一旦驻日美军统合作战司令部得以建立，美国将有可能与

8) 美国国防部, “Joint Statement of the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2+2”)”,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852169/joint-statement-of-the-security-consultative-committee-22/>. (2024年11月8日访问)

日本同时建立一个常设的双边联合规划和协调办公室，以支持具体双边任务的规划、演习和执行。

另外，美日也将针对中国提升延伸威慑力。2024年7月21日，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美两国政府计划编制首份关于延伸威慑的联合文件，即美国利用包括核保护伞在内的军事力量保护日本，日本和美国在文件中明确表达了加强威慑的决心（寺岛实郎 2024, 32）。而中国就是美日延伸威慑的主要对象之一。

美日认为，在战略层面上，中国一直在增加核弹头数量，预计到2030年将有1000枚核弹头。将有更多的导弹装备可从发射井和移动平台发射的多弹头可独立瞄准再入飞行器，这将加剧美国的脆弱性。在美国的战略认知中，中国拥有使用中程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压制日本和关岛基地的能力，从而能够有效地采用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战略来抑制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为了应对这些所谓的“威胁”，美日认为有必要加强延伸威慑。2024年7月28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与日本外务大臣上川阳子和防卫大臣木原稔举行了外长、防长2+2会谈，讨论了驻日美军指挥结构升级、美日延伸威慑部长级对话和加强日本生产美国许可的导弹等安保合作。

美日筹备建立联合作战司令部与美日延伸威慑对话机制的建设使美日在军事安全合作中的对华指向性日趋明显。

IV. 美日同盟对华战略的分歧及未来展望

1. 美日同盟对华战略的分歧

美日同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同盟体系围堵中国的核心节点，也是日本介入亚太地区事务，增加日本区域影响力的工具。尽管美日同盟在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上具有一致性，但因国家利益的不同，美日的对华威胁感知和对华经济政策仍存在差异性。

(1) 美日对中国威胁感知的差异

美日在涉华政策中的国家利益不一致，导致对华认知存在差异性(Winkler 2023, 334)。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中国实力的相对提升，使美国产生了危机意识，担忧中国会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加上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等领域的差异，美国难以建立对中国的信任，因此，美国处处对华遏制与打压。美国对华威胁认知建立在中国崛起对美国构成的间接威胁之上。在美国看来，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增强的主要影响在于会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但不会对美国安全构成直接威胁。随着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美国相对于中国的优势在降低，美国在国际事务上追求利益的能力将受到中国限制(凌胜利·方寅旃 2019, 50)。

与美国不同的是，日本对于中国威胁的认知源于中国崛起对日本带来的所谓直接威胁，对于日本来说，中国与其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上存在主权之争，地理位置的临近也会让日本感受到更加直接的威胁(Singh 2024, 30)。从日本的各种官方表态中可以发现其对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格外关注。2024年《读卖新闻》公布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92%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日本安全构成威胁——高于一年前的86%和2022年的81%。同年，日本政府内阁会议通过的《防卫白皮书》，不仅继续大肆鼓噪中国威胁论，甚至耸人听闻地宣称“日本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为严峻的安保环境”。《防卫白皮书》是日本防卫省关于周边安全形势和防卫政策的年度报告。自2020年以来，《防卫白皮书》就中国军力发展、台海、南海、钓鱼岛等问题不断发表中国具有威胁性的言论。上述信息表明，尽管美日均对中国的认知具有趋同性，但两国关注的国家利益存在差别，因而两国在合作中的侧重点存在一定的分歧。

(2) 美日在科技领域对华政策的分歧

美国更偏好遏制中国发展，日本倾向采取对冲策略，规避风险。为确保在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美国政府推行了系列具有针对性和抑制性的小院高墙科技竞争与打压策略。小院指直接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的特定

技术与研究领域，高墙指通过出口管制、签证限制管控等手段筑起的战略围墙，高墙之外不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对中国保持开放，而高墙之内的核心技术将得到系统和严密的保护 (Lee 2024, 14)。2020年，美国国会中国特别工作组正式提出小院高墙概念，针对基础研究和人工智能等领域提出应遵循自我强化、降低风险和保持开放的原则，确定美国在核心科技领域对华竞争策略的基本方向。拜登上台后，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重心从大规模大范围贸易战转向小规模小范围科技战，既不想因为与中国“硬脱钩”而失去在高科技之外与中国合作的利益，又想在前沿高精尖科技领域进一步扼制中国的发展态势，这一走钢丝行为本质上是为迎合美国科技界、商界利益，同时不断试探中国底线、不断压缩中国高科技产业生存空间。

日本虽担心中国制造会在产业和安全上对其带来威胁，但目前这种威胁主要是潜在的、预期的，未来也可以防范。相比之下，日本更担忧中美技术脱钩损害日本经济利益 (归泳涛 2020, 16)。日本的忧虑来自几个方面，首先，中美科技战将会使日本遭受连带伤害，日本将不得不面对美国政府日趋严格的出口管制、进口限制和针对特定中国企业的禁令；这将增加日本企业被逐出中国市场的风险；其次，中美技术脱钩会损害日本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脱钩导致两套标准和规程，会造成低效，因为美国政府的禁令会限制美国和日本的公司获得信息、市场和商业机会；再次，中美脱钩将切断日本企业的全球供应链，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成本；最后，中美“脱钩”会造成世界经济的集团化，严重影响增长前景。如果“脱钩”愈演愈烈，那么世界将分裂成以中、美为核心的两个经济集团，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很多产业的供应链将被切断，跨国公司将无法在全球配置资源。受此影响，贸易、投资乃至整个世界经济都可能陷入停滞。

面对美国对华科技脱钩政策，日本企业采取了相对中立的做法。日本产业界认为，在美国遏制中国政策的影响下，今后中国作为出口基地的重要性将相对下降。但是，中国产业基础雄厚，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美国与中国全面脱钩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Yi 2024, 20)。中美、中日经济高度互补，利益深度融合，美日两国从本国经济利益出发，不会放弃在于已有

利的领域继续与中国合作。日本产业界提醒政府不要一味追随美国,要确保本国的自主性。在日本政府密集出台经济安保政策的背景下,日本企业希望政府实现中美日之间的平衡和经济安全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平衡。日本企业希望日本外交能够平衡与中美双方的关系,在和美国保持步调一致的前提下,谋求和中国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利用RCEP以及中国正在申请加入的CPTPP等平台,继续与中国开展对话。日本企业还提出设立双重供应链或双轨制供应链,一方面是用来嵌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另一方面是用来嵌入以美欧为中心的供应链。为了规避地缘政治风险,某些日本企业正在考虑把美国业务和中国业务分离,分别加强美国业务和中国业务。

在对华科技战略上,美日两国存在明显的分歧。美国寻求与中国在科技产业链上的完全脱钩,日本一方面承受来自美日同盟的压力,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对中国高度依赖,因此采取相对中立的姿态,既在科技竞争中配合美国,又选择采取不与中国完全“脱钩”的政策。

2. 未来趋势与展望

2024年11月,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即将迎来二次执政。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时的对外政策极具交易特性,尽管特朗普二次执政将会对国际格局的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但可以预测的是,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奉行的“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基调将会继续保持。

(1) 经济领域强化对华贸易战

在对华关系上,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对华发动贸易战,开启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拜登执政后,继承了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的竞争态势。特朗普二次执政后,中美间的竞争态势将有可能延续,甚至加深与强化。2024年7月15日,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通过2024年纲领,其中包括一些针对国内外问题的政策变化。11月7日,特朗普胜选,即将迎来第二任期,根据2024年共和

党纲领的内容，可以推定出特朗普的一些政治政策与议事日程。2024年共和党纲领指出，保障美国人民的安全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国，共和党的计划是通过实力恢复和平，重建美国的军事和联盟，对抗中国，击败恐怖主义，建立铁穹导弹防御系统，促进美国价值观，保护美国的国土和边界，复兴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对抗中国被列入共和党纲领的议题中，在对华关系上，引用了“对抗”一词，表明美国对华认知仍是将中国视为外部威胁与竞争对手。在特朗普二次执政后，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态势将会只增不减。

在保持战略竞争的总体基调下，特朗普二次执政后，将会重点在经贸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与对抗。特朗普并没有明确主张将美国的战略转向与中国进行潜在的军事对抗，他倾向于在经济与社会层面对华开展竞争。在2024年共和党纲领以及各州的演讲和采访中，特朗普一直强调“保护美国工人和农民免受与中国的不公平贸易”、“从中国手中夺回我们的经济独立”。2018年，特朗普发起了一场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他发誓要在下一个任期内加倍提高关税。2024年11月，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特朗普提出，美国将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主任拉纳·米特表示，中美竞争关系正在迅速发展，如果特朗普兑现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关税的承诺，中美关系可能会持续动荡，该政策可能使双方就重置贸易关系进行的第一阶段的谈判相当严格。在军事对抗层面，例如台湾问题上，美国对台政策将会呈现出更强烈的交易性，特朗普威胁说，如若发生冲突，美国将对中国政府加征巨额关税。因此，特朗普第二次执政期仍将对华开展竞争。

(2) 外交领域扩大联盟体系

特朗普二次执政后将主要关注通过提高关税来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与此同时，特朗普将寻求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反制，寻求更多的多边主义手段，以应对中国带来的更广泛的挑战。有学者指出，特朗普政府若想对中国的经济行为进行实质性和持久的改变，或者限制中国的技术

发展, 就需要优先建立多边联盟。2024年共和党纲领中指出, “共和党人将加强联盟关系, 确保盟友履行义务, 投资于共同防御, 重建联盟网络, 以确保建立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未来。”可见, 维持联盟体系, 巩固联盟关系仍将是美国确保自身实力与领导力、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政策根基。特朗普第一任期, 提出了印太战略, 在特朗普的领导下, 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提升为部长级对话, 拜登执政后, 美日印澳四方对话又升级为领导人会晤。特朗普与拜登政府都支持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加强了美日印澳在基础设施融资等方面的协调, 以应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拜登执政时期, 强化了美日韩、美日菲等小多边安全合作框架。拜登政府的这些举措建立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寻求建立的联盟体系的基础之上, 因此, 特朗普二次执政后, 将延续拜登执政时期推进的盟伴体系, 并且, 亚太地区将持续受到美国的关注, 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首要场域。美日同盟仍是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的核心力量, 日本也表达了强化美日同盟的强烈诉求。2024年10月2日, 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与时任美国总统拜登通话, 希望加强美日同盟关系。石破茂表示, 将继承前首相岸田文雄与拜登的美日同盟强化路线, 并期望进一步加强美日韩及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志同道合国家组成的网络化联盟体系。11月7日, 石破茂与特朗普通电话祝贺其当选美国总统。电话磋商后, 石破在首相官邸对记者们表示“双方同意尽早安排日程举行会谈”。石破茂表示“双方一致同意将日美同盟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和阶段”。⁹⁾ 特朗普二次执政后将会推进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 并加强在供应链、新兴科技、网络安全等领域与盟友的合作, 以提升美国在亚太区域的影响力。

(3) 军事领域增强岛链围堵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 日本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急先锋, 美日同盟在印太战略中发挥核心作用。在特朗普二次执政后, 美日同盟的对华指向将

9) 日经中文网, <https://cn.nikkei.com/politics/economy/politics/society/57194-2024-11-08-10-10-32.html>. (2024年11月20日访问)

继续强化。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强调了第一岛链对美国的防御作用。在特朗普二次执政期可能会再次强调岛链的重要性，并将该战略框架扩展到第二甚至是第三岛链。在特朗普二次执政后，美日同盟的一项关键任务将是确保美国无障碍通过岛链，这些岛链对于美国全面推行印太战略至关重要。美日同盟在印太战略方面的合作将围绕“维持印太地区的安全”以及“应对印太地区可能发生的任何突发事件的能力”来展开。作为一个条约盟友，驻日美军基地构成限制中国向太平洋投射力量的第一岛链的很大一部分军力，日本对美国来说仍然很重要。

通过美日同盟合作的整体趋势分析，可以预测在规则层面，中国因素将继续出现在同盟的各项声明与安全文件中；在规范层面，美日同盟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将进一步呈现出趋同性，但在国家利益的影响下，日本可能继续采取对冲策略，规避风险；在实践层面，日本将在美国对华竞争战略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V. 结语

21世纪以来，美日同盟的对华战略指向愈发凸显，在规则、规范与实践三个层面，美日同盟的对华战略逐步强化。美日同盟的对华战略指向面临着来自美日两国威胁感知差异的挑战。此外，两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也使美日同盟面临困境。尽管如此，美日对华战略仍存在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在特朗普二次执政后，美日同盟将逐步拓展合作范围，在对华战略上，总体保持一致。美日同盟的遏华指向性，将会增加中国周边安全的不稳定性因素、阻碍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进一步激化中美间的竞争态势。由于美日同盟当前仍由美国主导，因此，中国应对美日同盟对华指向性的根本是处理好与美国的竞争关系。中美间的战略竞争，既是意识形态差异的产物，也是两国之间战略误判的结果，因此，化解中美间的竞争态势，避免战略误判是关键。对此，中国应审慎对待中美间的竞争关系，促进在中美两国间建立战略互信，同时强化中美危机管控机制。在处理好中美关系的同时，中国也应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相比于

美国, 日本在语言、文化与历史方面更了解中国, 如果日本有意愿扮演亚洲与西方之间的桥梁的角色, 日本将有能力为改善中美关系贡献力量。因此, 中国应在促进中日关系向好发展的同时, 积极引导日本扮演调和中美关系的角色。中国是一个和平崛起的国家, 有能力顺应时代潮流, 引领新时代大国关系, 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典范。

| 参考文献 |

1. 论文及专著

- Cha, V. (2017). "Informal hierarchy in Asia: the origins of the US - Japan alli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7. No. 1, pp. 1-34.
- Christensen, T. J. (1999).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pp. 49-80.
- Goto S. (2022). "Recasting US-Japan Ties in a New Era of Economic Security." *asia policy*. Vol. 17. No.4, pp. 225-238.
- Lee, S. (2024). "US-China technology competi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echno-economic statecraft in East Asia: High technology and economic-security nexu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pp. 1-20.
- Liff, A. P. (2022).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aiwan." *asia policy*. Vol. 17. No. 3, pp. 125-160.
- Rapport, A. and B. Rathbun (2021). "Parties to an alliance: Ideology and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58. No. 2, pp. 279-293.
- ROBERT, O. KEOHANE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 Singh, B. (2024). "How Japan Is Managing US - China Competition." *INDO-PACIFIC SECURITY: US-China Rivalry and Regional States' Responses*, pp. 27-43.
- Winkler, S. C. (2023).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US - China relations: A conceptual analysi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6. No. 3, pp. 333-356.
- Yi, C. D. (2024). "The effects of US-Japan trade agreements on production, sales, factor demand, and price in competition and firm structure."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pp. 1-21.
- 高桥庆吉 (2021). "中国か、日本か: アメリカの選択と日米同盟の形成." 『阪大法学』. Vol. 71. No. 3-4, pp. 139-167.
- 归泳涛 (2020). "日本与中美战略竞争——贸易战、科技战及印太战略." 『国际论坛』. Vol. 22. No. 3, pp. 3-18, 155.
- 凌胜利·方寅旃 (2019). "共识下的游离:美日在对华安全政策上的分歧." 『日本学刊』. No. 2, pp. 46-68.

- 寺岛实郎 (2024). “日本は「实质核武装」の危うさに 大統領選は日米同盟再考の契機.” 『エコノミスト』, Vol. 102, No. 27, pp. 32-33.
- 阮宗泽 (2014).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前景论析.” 『世界经济与政治』, No. 4, pp. 4-20+156.
- 王鹏权 (2021). “美国印太战略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特征分析.”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No. 3, pp. 131-144.
- 张景全 (2006). “从同盟机制角度看美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态度.” 『当代亚太』, No. 9, pp. 26-30+53.
- 项昊宇 (2023). “日本“安保三文件”初析：战略转型与前景展望.” 『和平与发展』, No. 1, pp. 97-112+156+159-162.

2. 其他

- China Military. http://eng.chinamil.com.cn/BILINGUAL/Opinions_209205/16200790.html. (2024年3月16日访问)
- 美国国务院.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f-the-u-s-japan-economic-policy-consultative-committee-strengthening-economic-security-and-the-rules-based-order/>. (2023年7月8日访问)
- _____. <https://www.state.gov/welcoming-japans-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national-defense-strategy-and-defense-buildup-program/>. (2023年3月20日访问)
- 美国国防部.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3196800/allies-modernization-at-heart-of-us-japan-efforts-in-indo-pacific/>. (2023年3月16日访问)
- _____.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3852169/joint-statement-of-the-security-consultative-committee-22/>. (2024年11月8日访问)
- 美国白宫 (202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2024年11月1日访问)
-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https://www.csis.org/analysis/now-real-work-begins-us-japan-alliance-after-upper-house-elections>. (2023年3月20日访问)
-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2023). “Japan Defense Programs and Budget FY2023.” 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4-04/20230000_modjap_japan_supplementary_2023_japanese.pdf. (2024年11月2日访问)

日经中文网. <https://cn.nikkei.com/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57194-2024-11-08-10-10-32.html>. (2024年11月20日访问)

日本防卫省. https://www.mod.go.jp/j/policy/agenda/guideline/strategy/pdf/strategy_en.pdf. (2023年3月20日访问)

| 논문투고일 : 2024년 11월 25일 |

| 논문심사일 : 2024년 11월 26일 |

| 게재확정일 : 2024년 12월 12일 |

| ABSTRACT |

**Current Status, Differences and Prospects of the
U.S.-Japan Alliance's Orientation toward China: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les', 'norm', and 'practice'**

BA Dian-jun

(Northeast Asia Research Center, Jilin University)

GENG Fei-man

(Northeast Asian College of Professional, Jilin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ew direction of US-Japan alliance cooperation in China from three aspects: rules, norms and practic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global economic center has shifted to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China'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ing.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US-Japan alliance has carried out strategic adjustments in three dimensions: rules, norms and practices, and its directivity toward China has gradually emerged. At the rule level, the China factor frequently appears in documents such as the joint statement and defense guidelines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institutionalized cooperation. At the normative level, the two sides have reached a strategic consensus on containing China's rise, and have formed alliance norms through common threat cognition. On a practical level, the US-Japan alliance has become a key tool for containing China.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despite the differences in threat perception and policy orientation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in cooperation with China, the China-oriented orientation of US-Japan alliance cooperation will continue and deepe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ino-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the upcoming second term of Trump.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strategic direction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towards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ism, and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and cooperation of the alliance.

- Key words: Us-Japan Alliance, China Policy, Rule, Norm, Practice

| 국문초록 |

미일 동맹의 대중 지향성 현황, 차이 및 전망: 규칙, 규범, 실천의 시각으로 분석

파전군

(길림대학교 동북아연구센터)

경비단

(길림대학교 동북아학원)

미일 동맹 협력은 새로운 발전 형태로 나타나고 있어서, 본 연구는 자유 제도주의 이론적 관점을 토대로 규칙, 규범, 실천의 세 가지 시각에서 중국에 대한 미일 동맹 협력의 새로운 지향성에 대해 살펴보고자 한다. 21세기에 들어서면서 세계 경제의 중심이 아태지역으로 이동하고, 중국의 국력이 지속하여 발전하자, 규칙, 규범, 실천의 세 가지 측면에서 미일 동맹은 전략 조정에 들어갔으며, 점차 중국에 대한 지향성으로 나타나고 있다. 규칙 측면에서, 중국 요인은 미일 동맹의 공동성명과 방위지침 등에 자주 등장하면서, 제도적 협력의 주요 내용을 이루고 있다. 규범 측면에서, 미일은 중국의 부상을 억제하기 위한 전략적 합의를 도출하고, 공동 위협 인식을 통해 동맹 규범을 이루고자 한다. 실천 측면에서 미일 동맹은 중국을 억제하는 핵심 수단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본 연구에서 미일 동맹이 중국에 대한 협력 중에서 위협 인식과 정책 방향에서 이견이 있음에도 불구하고, 미중 간 전략적 경쟁 심화와 트럼프 2기 출범을 앞두고, 미일 동맹의 중국에 대한 지향성을 더욱 강화할 것으로 보인다. 이에 본 연구는 제도주의적 관점과 연결해 미일 동맹의 대중 전략 방향을 분석하고, 동맹의 발전과 협력을 이해하는 데 새로운 시각을 제공하고자 한다.

▪ 주제어: 미일동맹, 대중정책, 규칙, 규범, 실천